

# 太平天国后的浙江学风变迁

## ——以戴望为中心的研究

徐立望

【摘要】太平军被镇压后,随着湘军的胜利,理学思潮盛行。浙江文人群体与此风气颇有违背,个中代表尤以戴望为最。他痛诋宋儒如大敌,高倡公羊经说,重拾沉寂百年的颜李之学,与俞樾、谭献、赵之谦、孙诒让、杨岷、凌霄等人多有共同的治学旨趣,在多个领域有密切交流。由他的学术历程,亦可窥见晚清浙江学术发展之一斑。

【关键词】戴望;理学;今文经;颜李学;浙江学风

【中图分类号】K25;B259.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5)02—0115—08

【作者简介】徐立望,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310012

戴望在晚清学术史上颇有地位,在今文经学、南明史学、颜元之学、《管子》校勘等领域都有一席之地。又由于成名较早,而37岁即去世,后人对他的学术辈分并不明了,陈垣曾特意以俞樾作对比,写《戴子高年岁及遗文》作一澄清,讲到“吾人恒感觉子高为前辈,曲园为后辈,而不知其实适相反”。<sup>①</sup>戴望去世后,同时交往之人纷纷撰文纪念,有至友施补华的《戴君墓表》,同门张星鉴的《戴子高传》,以及庄棫的《戴子高哀辞》、谭献的《亡友传》,前三篇都收入缪荃孙所编的《续碑传集》。后世写定的传记,以刘师培的《戴望传》最为出色,影响最大,实开戴望学术研究之先河。<sup>②</sup>

戴望有诗文集《谪麟堂遗集》和今文经学论著《戴氏注论语》及《颜氏学记》流传于世。<sup>③</sup>台湾曾影印出版《戴东原戴子高手札真迹》(台湾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版),收入戴望写给同乡好友凌

① 陈垣《戴子高年岁及遗文》(香港《大公报·艺林周刊》1964年6月10日。此文选入陈智超等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刘师培《戴望传》,《左庵外集》卷18,《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828—1829页。此外,后人所写传记,还有支伟成的《戴望传》(《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31页),语多引自刘师培所撰文;陈琦《德清戴子高生平及其著作》(《浙江省通志馆馆刊》创刊号),其文综合张星鉴、施补华所述以及戴望撰的《颜氏学记序》,并谈到戴望与孙衣言、孙诒让的信件来往;俞寰澄《德清戴望传(附程可大周中孚凌堃程贞姚谔)》(《浙江省通志馆刊》第2期)着眼于戴望与湖州学者的交流;费行简撰《近代名人小传·戴望传》(《清代传记丛刊》第202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347页)简述了戴望的学术经历,不过提到戴望“以诸生初肄业诂经精舍,避寇乱之上海,乃师事樾”,却与史实不同。

③ 有关戴望的研究,刘师培、章太炎都强调了戴望严守夷夏之防,称赞他不与清廷同流合污。(分见刘师培《戴望传》;章太炎《哀后戴》,朱维铮、姜义华选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梁启超与钱穆在论述清代学术史的著作中对其有涉及,但篇幅不多。专题研究,大陆有孔祥骅《略论戴望的〈论语〉学》,《管子学刊》1999年第4期;张永平《戴望述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张利《戴望学论》,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该论文部分内容以《戴望的汉学与宋学》为题发表于《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朱淑君《戴望经学述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增刊;黄珊《孔子改制与〈论语〉研究——刘逢禄至戴望的〈论语〉学》,《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王学斌《论清代〈管子〉校勘中的学术传承——以王念孙、陈奂、丁世涵、戴望为系谱的考察》,《管子学刊》2010年第1期;兰秋阳《孙诒让与戴望交游详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王学斌《经世者之选择:戴望与〈颜氏学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第11期。台湾地区的研究,有陈静华《清代常州学派论语学研究——以刘逢禄、宋翔凤、戴望为例》,台湾成功大学硕士论文,1993年;刘锦源:《戴望生平及其论语学》,《马偕学报》2001年第1期。这些研究文章,大多数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戴望的学术成就;二、戴望的学术思想;三、戴望的学术传承与学术交流。

霞信札 32 封。这批基本能反映出戴望思想全貌的信札,由于出版时比较仓促,次序颠倒,也没有编号,而信札落款又大多没有年份,迄今未为学者所留意。我们将其释读并编年,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摘引信札即来自此书。

关于戴望早期学术经历,同乡好友都有记载,姚谔说:

子高幼时即努力为文章,其立言大旨必通乎经而期适于用。已乃稍变为训诂之学,已又治宋儒者言,已又习为习斋恕谷之说。盖自始学以至于今,数变易矣,而大旨期于有用。<sup>①</sup>

施补华则指出:

十数年中,君之学凡三变:始为诗古文词,而研求性理,最后至苏州谒陈先生,遂专力于考据训诂。<sup>②</sup>

两人都提到戴望曾致力于宋儒之学,但戴望在同治八年(1869)回顾自身的学术经历,却跟他们的描述又有不同,根本没有提到理学。他说自己在 14 岁得到祖藏颜元斋书,读而好之,咸丰七年(1857)又习词赋家言、形声训诂、校讎之学,咸丰七年(1857)游学陈奂、宋翔凤两先生门下,开始学习西汉儒说,并对今文经学有所接触。<sup>③</sup>以上数说,虽互有出入,也大致描画了戴望 25 岁以前的学术经历。饶有意味的是,关于戴望早期学术经历的记载,反而是姚谔、施补华比戴望自己的叙述更为可信。姚谔在咸丰十一年(1861)与戴望分开,同治三年(1864)去世,其文写于 1861 年前,是对于戴望学术经历较真实的描述。而戴望本人回忆已在学术定型之期,很明显,此时的戴望觉得早年研读宋儒性理之学是人生的污点,不愿重新提及。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早期戴望走的是一条浙江多数士人的普遍道路,学诗词歌赋、理学,还有江浙地区的学术传统——音韵训诂。戴望虽也对今文经学有所研习,不过并不重视。但就在咸丰十年(1860),也就是戴望接触今文经学 3 年后,战火直接影响太湖流域,戴望“避穷山中,徐徐取读之,一旦发寤,于先生(刘逢禄——作者注)、宋先生(宋翔凤)书,若有神诰迥然”。<sup>④</sup>深山苦思,让戴望认识到社会衰败的症结就在于宋儒性理之学的祸害。他确信宋儒害道,实为空疏无用之学,不能躬行实践,却假托名高静坐读书。他也由此确定后来的人生目标:抨击虚伪理学,揭发常州公羊之学,倡导《春秋》改制思想,又以颜元之学加以充实,同时编辑明末历史,表彰遗民忠义气节。而他的性格,又是如此孤傲,不能如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今文家温和地著书立说,而是不停地与人争辩,以驳倒宋儒为快事。故时人记其“性倔傲,门户之见,持之甚力。论学有不合家法者,必反复辩难然后已。人故忌之”。<sup>⑤</sup>

时间前推 50 年,戴望或许只是普通汉学家的一员,而且也是不大引人注目的一员。他研习的今文经学和颜李之学甚至不能引起主流学术圈的兴趣。而彼时汉宋争辩也是稀松平常之事,以桐城派为首的宋学被汉学压制而处于下风,仅仅依靠官方的扶植,以文学为媒介,暂时还保留着一块尴尬的领地。但是乾嘉汉学鼎盛之后,到道咸之际已显颓势,再加上咸丰年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清军与太平军在江南反复拉锯,极大地破坏了江浙的学术环境,汉学发展的文化氛围基本被摧毁。而

① 姚谔《梦隐图题辞》,《景詹阁遗文》不分卷,清宣统三年(1911)归安陆氏刻本。

② 施补华《戴子高墓表》,《泽雅堂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60 册,第 360 页。有意思的是,《谿麟堂遗集》卷首的《戴君墓表》说“君学凡三变,始好为词章,继读博野颜氏元之书,则求颜氏学;最后至苏州谒陈先生奂而请业焉,通知声音训诂,经师家法。复从宋先生翔凤授《公羊春秋》,遂研精覃思,专志治经。”两文差异关键之处是戴望有无研习过程朱性理之学。附于戴望文集出版的墓表,很可能是施补华尊重戴望的遗愿,清楚戴望在咸丰九年(1860)后视宋儒为大敌,故而没有添加如此一笔。后来施补华修改墓文,悲痛之心较为淡去,能够如实地记载这段经历。

③ 戴望《颜氏学记序》,《谿麟堂遗集》文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 1561 册,第 150 页。

④ 戴望《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先生行状》,《谿麟堂遗集》文卷一。

⑤ 张星鉴《戴子高传》,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 75,《清代传记丛刊》第 119 册,台北明文书局 1985 年版,第 330 页。

理学重镇湖南涌现出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刘蓉大批理学将领,依靠他们,清廷最终解决了立朝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湘军的胜利终为宋明理学长出了一口气。如果说在清朝初期士人们把明朝覆灭的原因多归结于理学的空疏无用,从而为汉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那么太平天国末期以后湘军的胜利却意味着理学的胜利,宋儒语录重新成为学界流行话语。理学家如吴廷栋、方宗诚、夏忻等人很是活跃,甚而认为国家内乱就是汉学盛行的结果。此消彼长,汉学者的声音越加弱化。乾嘉时期汉学者大多强调汉宋之辨,坚信汉学比宋学更能体现圣人之道的话,那么此时多趋向讲求汉宋调和,陈澧、朱一新即是代表。

理学盛行一时,从施补华删改自己所写的戴望传记,也可见一斑。戴望去世不久,施补华即写《戴君墓表》述道:

时兵事大定,文治聿修,自公卿以至将帅,咸慕儒术,皆将称道程朱,比踪孔孟,而君所讲习又与世违异,伏处郁郁,冀有能纂述。

这篇文章被放置在《谿麟堂遗集》卷首,遗集在戴望歿后二年即由赵之谦整理刊印,应是施补华饱含情感率性而写。但后来收入施补华文集时这段文字被完全删除。很可能施氏觉得此段颇违时忌,又加以改定。缪荃孙所编《续碑传集》收入的《戴子高墓表》,就是照录删改后的文字。

## 二

在理学甚嚣尘上的这种背景下,戴望骂宋学的声音弥足响亮,而且可能是最响亮的。他写给凌霄的信札谈道:

今见当涂夏忻、桐城方植之著书,力诋乾嘉诸巨儒,以为咸丰以来,粤贼之祸,皆东原、仲子诸先生所酿成,可为轩渠嗟乎?宗方苞、姚鼐之绪论不谓,其流祸猖狂至此极也。较之陈建、吕留良之诋讽王文成,尤不可堪忍。此真所谓其父杀人,其子必且行劫是也。<sup>①</sup>

内有宋儒祸道,已使戴望忧虑,外有西人入侵,更让他痛心。咸丰十一年(1861),他已言道:“方欣业文史,遑计值纷争。东南据封豕,幽蓟骇奔鲸。窜迹经年久,穷涂万恨并。”封豕和奔鲸就分别代指太平军和西人。同治五年(1866)五月十六日,致凌霄信提到:

西夷无礼,请耶稣配享孔子,自京师以至各直省,均欲设立西国督抚、宰辅,名为助政,闻已允行,世变至此,可为痛心,安得如唐宗明祖者,出救斯民于涂炭以否?吾辈抱杞人之忧乎!<sup>②</sup>

同年九月十二日写道“西人行同禽兽,可恶之至,而天助其虐。近闻攻高丽,又克矣,乌呼!”

西人能如此层层进逼,在戴望看来,与“谋国者”自身的软弱无能密切相关。进入金陵书局后,他骂宋儒并及湘军将领:

世事纷纭,师资道丧,原伯鲁之徒,咸思袭迹程朱以自文其陋,一二大僚倡在于前,无知之人和之于后,势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所冀吾党振而兴之,征诸古训,求之微言,贯经术政

<sup>①</sup> 戴望与凌霄札,同治五年(1866)十月十二日。

<sup>②</sup> 此信针对指赫德在同治四年(1865)九月十八日递交总理衙门的《局外旁观论》而发。戴望与凌霄信札,谈到西人处甚多,甚至奉劝凌霄不要待在上海,原因即上海受西方影响太大。同治六年(1867)正月致凌霄信谈到“上海县城外一尺地,即属西人所辖,信或如此,则此地宜非志士所居也。”后又写道“沪上不可久居,十年后,此地必为海若所吞。腥膻之气,非此不足荡涤,人心即天心也。金陵亦欲造天主堂,庚申之约,皆由谋国者之不臧曲意承顺,至弃周、孔之教不顾,罪浮于秦桧矣。”张永平认为戴望“盛慕海外立宪政体,吸取西学,附会孔子微言,用今文经学的语言表达了对君民共主政体的向往”不知有何依据。见张永平《戴望述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事文章于一,则救世敝而维圣教在是矣。<sup>①</sup>

他的批评锋芒甚至于直指曾国藩,同治十年(1871)与凌霞札写道:

为人师,与好作人门生,称受业弟子,其习自明而盛;……翰林馆中,最为积习,不幸而翰林出为大僚,且能领军杀贼,能属文,于是侈然自命为三不朽,自视可以为人师,广收门下。而其徒效之者接踵,士之干泽者,亦随之者接踵。是以今之天下,师生之天下也。

刘师培、章太炎等人也恰恰因戴望不曲学进身,而把他刻画成清末民族运动的先导人物。刘师培认为:

(戴望)谓后世兵不知学,斯盗贼夷狄角逐于天下(《汪仲伊握奇图解序》),喜诵姜斋、亭林遗书,以发扬幽潜为己任。……盖先生眷怀胜国,有明季遗民之风。嫉视湘军诸将帅,方张汶祥刺马新贻,先生适居金陵,闻其报,拍案称善,目汶祥为英杰。呜呼,此可以观先生之志矣。<sup>②</sup>

如果说刘师培发表此文时因仍处在清朝统治时期,只能通过强调戴望“眷怀胜国,有明季遗民之风”来暗指戴望所说的盗贼夷狄就是湘军、清廷之流,那么到了1944年,范文澜在延安所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就直说道“当时一位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今文学大师戴望,给曾国藩一类人下了定评,说是‘贼盗夷狄,相帅(率)角逐’(《汪仲伊握奇图解序》),真是一点不错。”<sup>③</sup>

诚如上文所述,戴望确实嫉视湘军诸将领,但这是因为他们扶持理学,戴望不满谋国者曲意承顺西人,乃至弃周、孔之教不顾。戴望不可能暗指盗贼夷狄就是湘军、清廷之流,他也毫无反清壮志。<sup>④</sup>戴望序言原文如下:

暴秦而降,汉之高帝、光武,明之高皇,兵与道合。不合者,贼盗窥人国,夷狄窃王铎,胜者屠城破邑,杀人亿千百万,败者掠野,醢人畜以为食,虽有君子莫之能御也。事幸而得集,则号为君子者,从而登其朝,伺其谷,朝跪尧舜之,夕见汤武之矣。乡所谓屠城略野之徒,盈其贯以死,从而扬之,曰此元功重臣,与伊挚吕尚论功同德者也。吾尝受羸刘以往史氏之书,皆以是观矣。於呼,是其何也?则由于虚灵冲漠坐尸嘘之徒之,张目拱手,而谋人家国者阶之厉也。不知道,不通兵,致道离兵而兵不保道。贼盗夷狄遂相帅角逐,反以兵胁迫,灭道,不大可哀哉?<sup>⑤</sup>

通篇而论,戴望认为内乱外患的造成,是那些“虚灵冲漠坐尸嘘之徒之”的结果。“虚灵”来自朱熹对《大学》“明明德”的注释,“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冲漠”当来自程颐所谓“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sup>⑥</sup>后来王阳明加以引用,谓“万象森然时亦冲漠无朕,冲漠无朕即万象森然。冲漠无朕者一之父,万象森然者精之母”。<sup>⑦</sup>而“坐尸”即是古代祭祀时晚辈象征死者的亡灵,静坐受祭。这些词语都是借指理学之人,静坐谈心性,少躬行实践。

① 张星鉴《戴子高传》,《仰萧楼文集》不分卷,光绪六年新阳朱氏刻本。戴望以骂宋学出名,以至于有野史编说道:戴子高在金陵书局,著《论语正义》,得一新义,则往学宫,对朱子牌位溺溲。此段言语颇为粗鄙,不过里面透露出的信息,倒是与一段史料类同。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十一日,张文虎记载:赵季梅邀李小湖、壬叔、叔俯、端甫午饮至晚。有人醉入学宫,登殿大骂紫阳。见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12页。里面涉及的人物李联琇、李善兰、唐仁寿、刘恭冕等人都是谨小慎微之人,骂朱熹者当是戴望无疑。

② 刘师培《戴望传》,《左庵外集》卷18,《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828页。

③ 该文最先连载于1944年7月25、26日《解放日报》,后作为附录收入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955年第9版。

④ 需要说明的是,刘师培以马新贻被刺,戴望拍案称善为例来证明戴望敌视湘军。但事实上,马新贻并非湘军将领,他是山东菏泽人,为袁甲三所提拔,而且清廷让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目的就是不让曾国藩在江南坐大。

⑤ 戴望《汪仲伊握奇图解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61册,第151页。

⑥ 程颢、程颐《伊川先生语》,《二程遗书》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⑦ 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颇有意味的是,戴望痛骂宋儒,其时已是异端,但曾国藩虽与他论学不合<sup>①</sup>,却有容人雅量。施补华后来论及戴望与曾国藩的关系时,有诗谓“读书已违俗,避试更疑众,短褐走风尘,往往逢嘲弄,开阁上相尊,接席经生重,六年任校讎,颇获量才用,平生忧患余,期免饥与冻。”<sup>②</sup>短短几句诗,已把戴望的境遇写尽。曾国藩对戴望的知遇之恩,戴望明白在心。他在曾氏去世后,连写挽词四首,表达哀痛之情,其中一首写道“古称三不朽,公举足当之,欲泻长河泪,为题诵德坊,九京谁可作,一艺愧相知,穗帐空堂上,论文议昨时。”<sup>③</sup>他的哀痛之情如此明显,甚至于被人称为“四海苦曾侯,无似斯人痛。(曾侯薨,君哭之哀,疾遂亟)”<sup>④</sup>。戴望的肆无忌惮,必然招致很多人的不满,曾国藩在当时虽然对他庇护有加,但他仍很难在金陵立足,便准备到苏州寻找生计。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九写信给凌霞“弟大约有吴门之行,相郎于弟不可谓不厚,其奈市虎之言何?”同年三月十六日,又道:“弟本欲移局吴中,而湘乡再三慰留,不得已仍羁此间,然砭砭之节,十不变一,恐终为时伪所不容,待至秋间得《论语注》刻完,即当托故以去耳!”曾国藩病故后,他的处境日益艰难,据谭献谓“曾公薨,君好诋宋学,日与要人龃龉。……独客忧伤,死于江宁书局”。<sup>⑤</sup>

### 三

戴望痛斥宋儒,同时也宣扬今文。信服公羊学后,他努力扩大今文经在清儒学术系统的影响。咸丰十一年(1861)他25岁时就决定编写学案,俞樾有诗为证“戴望富经术,卓卓后来彦。……他年海外归,待子定学案(子高尝有志定国朝学案,故云)。”<sup>⑥</sup>我们没有看到学案的问世,但其中思路在他拟定的续刻《皇清经解》目录中可见端倪。同治初年,俞樾与戴望商定续刻阮元《经解》,戴望拟目一份。同治七年(1868),俞樾到南京与曾国藩见面时谈及此事,曾氏应允出资刊刻,不过,此续编最后还是没能问世,惟有目录收入俞樾的《春在堂笔记》。十几年后,担任江苏学政的王先谦完成《皇清经解续编》,但自成体系,收入著书与戴望拟订的书目存在很大不同。虞万里对此有所比较:

戴望《目录》共九十一种(戴所谓补刻者不计),与王刻相同者仅四十三种,不及其半。……其书目拟收庄存与、刘逢禄、庄述祖、庄有可、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等今文学家著作达三十六种(其中存与九种,述祖八种,源五种),其中为王刻所收者十二种。此外,王收戴遗者有陈立、迮鹤寿、邵懿辰等三人四种。即此可见戴目王刻之不同倾向。<sup>⑦</sup>

戴望借助续刻经解为公羊学大张其军的计划没有实现,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公羊学研究上,而成果主要体现在《论语注》一书。咸丰九年(1860)转向公羊学后,戴望着用手用公羊思想替《论语》作注。我们现在看到的对戴望《论语注》最早的介绍,出自谭献同治元年(1862)九月初九日的记载“阅戴子高《论语注》,认为大段完善,尚鲜精诣,略采四则以见一斑。……其他亦绝无迂曲穿凿,可传也。”<sup>⑧</sup>同时,谭献还摘录四则注,有赖于他的笔勤,我们得以比较清晰地了解戴望公羊说的形成过程。

① 曾国藩赞宋儒,斥颜李,直与戴望针锋相对,如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嗜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宋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矫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66页),

② 施补华《哭戴子高》,《泽雅堂诗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560册,第142页。

③ 戴望《赠太傅曾文正公挽词四首》,《谪麟堂遗集》诗卷一。

④ 施补华《哭戴子高》,《泽雅堂诗集》卷六。

⑤ 谭献《亡友传》,《复堂文续》,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鹤斋刻本。

⑥ 俞樾《次戴子高韵即送其之闽》,《春在堂诗编》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551册,第392页。

⑦ 虞万里《正续清经解编纂考》,《学术集林》第4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191页。

⑧ 范旭仑等整理《谭献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207页。

根据谭献日记所记,我们看到有两则《论语》注与11年后的刊本相比,解释没有变化。分别是:(一)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二)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有两则发生较大变化,一为: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戴望同治元年(1862)注语“腐木秽土,谗世乱不可为治。宰我伤道不行,故假昼寝以自晦其明。夫子谓天下虽乱,吾心自治,君子乐天知命,虽毁弃何伤乎?”<sup>①</sup>而1873年刊本中,此注有了较大的变化,并在最后一段加上一句话“《春秋》至定、哀世,鲁益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此段话的强调,说明戴望深刻理解从何休到庄存与、刘逢禄一派公羊核心理论之一——三世说,体现出《公羊》所认定的素王孔子,只是通过书写《春秋》来表达出自身的政治愿望。《春秋》大义昭示的据乱、升平、太平的历史哲学与春秋末年动荡不安的史实背离,被公羊家认为是孔子的《春秋》笔法的精微所在,也是理解公羊学“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关键点。事实上,戴望此语抄自刘逢禄,刘氏说“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内诸夏而不言鄙疆是也;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讥二名、西狩获麟是也。”<sup>②</sup>

较大变化的另一则为: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同治元年(1862)注语“《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盖作《春秋》时语也。”

1873年刊本注语“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子曰: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sup>③</sup>

对比前后两个版本,虽然都是引用《史记·孔子世家》,但是很明显看出戴望的着力点不同。前者仅仅考证孔子“没世而名不称”此语的说话时间和心理状况,讲述一个史实,而后者体现出孔子的远大抱负和政治愿望,并且更加强烈地与《春秋》经联系在一起,强调西狩获麟和春秋“新王”的因果逻辑,表现出公羊学所擅长的讖纬特征。平心而论,就公羊经学术成就而言,戴望创见实为不多,他更多地引用刘逢禄、宋翔凤的观点,尤其是宋氏的《论语说义》。<sup>④</sup>

目前流传在世的戴望论语著作版本,封面题字为赵之谦所写的“戴氏注论语二十卷释文二卷”,但事实上释文二卷并没有随同雕版。当时释文应该基本完成,而且卷数也已经确定,故请赵之谦一并题字,但是因故释文出版搁浅,导致流传下来的题字与内容的不符。谭献颇有诤言“《论语注》,取之刘逢禄、宋翔凤者大半,间有鄙说,然皆不言所本,殆欲后世作疏邪?”<sup>⑤</sup>释文二卷究竟讲述什么内容,戴望在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十九日写给陈澧的信中有所透露:

至其中所引用前哲诂言,因作注时行文不便,大加润色,故其名氏皆具于《论语证文》四卷之中(原注:原名释文),尚未刊行,明春亦当寄正也。<sup>⑥</sup>

但是不久戴望病故,释文也就没有问世了。虽然戴望的公羊之学还只是被少数人所赏识,但随着一些学者如谭献、杨岷、赵之谦(以上三人是戴望好友,他们并非专门的公羊学家,然学术旨趣偏向公羊学)等人的立说,公羊学自然在扩大影响。甚至如江南学界的领袖人物俞樾,不时在著作中透露中对于公羊学的爱好。在他写给瞿鸿禛的信中谈到:

① 戴望《戴氏注论语》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57册,第99页。

② 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

③ 戴望《论语注》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57册,第206页。

④ 关于戴望的《论语》在多大程度上集成了庄、刘、宋之说,他们几个人有没有各自的不同点?同时期人对此书的反应等等,涉及的问题较多,限于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展开。

⑤ 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一日日记,范旭仑等整理《谭献日记》,第255页。

⑥ 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岭南学报》1935年第4卷第1期,第107页。

本朝经学超越元明,盖有三派。昆陵一派,主微言大义……新安一派,主名物制度……高邮一派主声音训诂,其事至纤细,然正句读辨文字,实有前人所未发者……鄙人生平致力于此,……乃亦时时旁溢于彼二派,……如以《王制》一篇为孔子将作《春秋》,先自定素王之制,门弟子掇其绪论而为此篇。<sup>①</sup>

同时,因上位者如潘祖荫、翁同龢等人的推重,公羊学逐渐进入士人的视野,慢慢变成时髦之学。后世学者在研究近代公羊学发展时,一般都会沿寻几位公羊家的论学主旨,完成从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的三级跳描述,并没有很好地注意到龚魏到康有为之际,公羊学说能造成如此大的声势,与其间这段历史的铺垫密不可分。戴望毫无疑问是承上启下极为重要的一员。故而,清末的公羊学说能在19世纪90年代末掀起如此大的波澜,与之前公羊学家如戴望、喜好公羊学的学者如谭献、欣赏公羊学的士人盟主潘祖荫、翁同龢等三种类型人物的推挽息息相关。

戴望讲求今文经,认为能由此追溯圣人微言,又觉得礼失求诸野,故对日本、朝鲜典籍特别关注,希望以此补充现有的中国材料。同治五年(1866)四月初四致凌霞信札写道:

沪多见日本人否?多购日本人著书否?务为弟留意是幸。先王之礼乐文章,尽在朝鲜、日本。吾先子欲浮海至朝鲜以求箕子遗教,吾愿师之。

同年九月十二日,写道:

弟在杭州得日本人物茂卿所著《论语微》,甚佳!东国人文胜于今日之中华矣。浮海居夷,吾先子岂灵语哉?<sup>②</sup>

同治七年(1868年),有诗谓:

海水连琼浦,遥瞻日出乡,衣冠符汉制,典籍自周王,羨尔通经术,惭予仰圣墙,乘桴如有便,吾欲往东方。<sup>③</sup>

戴望将中国与日本、朝鲜相比,抑扬之间,也有对当前社会不满的无奈表现。日本、朝鲜典籍对戴望的帮助毕竟有限,让他把今文经圣人微言落到实处是颜李之学。而戴望于思想史的贡献,就在于他对两者的结合。戴望阅读颜李之学甚早,但是重视颜李学,还在研究公羊经之后。据其自言:

从陈方正、宋大令两先生游,始治西汉儒说,由是以窥圣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义。益叹颜先生当旧学久湮,奋然欲追复三代教学成法,比于亲见圣人,何多让焉。<sup>④</sup>

如果说公羊学体现出的是经术,那么颜李之学就是政事。颜元矫正宋儒讲学流弊,宗旨在于:

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sup>⑤</sup>

同治十年(1871)五月四日,戴望与凌霞信中,将程朱理学与颜李学作简要对比:“世之学程朱陆王者多,而学颜李者少,颜李之学,得寸即寸,得尺即尺,不可○○,程朱陆王可伪托也。”

颜李著作沉寂百年,全集收集颇为不易,幸赖赵之谦帮忙。戴望言“会稽赵执叔,当世之方闻博学,振奇人也”,而赵氏得知戴望需要颜李之书,“怒焉如己忧”,到处搜集,于同治七年(1868)无意得到后送至南京。第二年戴望就辑成《颜氏学记》。此书的完成,对颜李之学重现于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参见《超贤楼藏耆贤书札》,《中和月刊》第6卷第2期。此信写于1898年,此年正值戊戌维新风云变幻之际,言语中自有与康有为撇清关系的意味,但是也反映出19世纪70-90年代的学术风气。关于俞樾的公羊学说,可参考罗雄飞:《俞樾公羊思想发微》,《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② 同治六年(1867),询问俞樾在上海是否碰到日人,有无见到他们著作等情况。俞樾回道“日本士人,仆于上海亦见其一,然不足谈,盖非足下所见者,近得彼国人安井仲平《管子纂诂》,足下亦得之否,其书似不及物君之《论语》,征然!”(《与戴子高》,《春在堂尺牘》卷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13-514页)

③ 戴望《赠日本摘融》,《谪麟堂遗集》诗卷二。

④ 戴望《颜氏学记序》,《谪麟堂遗集》文卷一。

⑤ 颜元《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存学编》卷一,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页。

戴望将颜学与《论语》结合的做法,引起了学界反应,另一位浙江学人朱一新并不为然,论道:

颜习斋以宋儒为空虚无用,而欲以六府三事、六德、六行、六艺矫之。动称水火工虞,兵农礼乐,聆其名甚美,按其实则皆非也。《论语》一书为六经之辖辖,多言道而不言艺,论治道者备矣,而不甚言制度。盖道者,千古莫易,制度则当随时损益,艺亦古今不同。……《论语》言治国之道,敬信节爱,而何以敬,何以信,何以节用,何以爱人,条目亦不备详,其他言治道者,大抵类此。此皆随时变通之事,心知其意则千条万辙,涂径不同而归于敬信节爱之旨,儒学之学所以可贵,宋儒穷理之所以不可废。否则,后世胥吏之天下而已。<sup>①</sup>

朱一新也清楚颜学本欲矫正理学之流弊,但他认为《论语》与颜学是道与艺的区别,圣人之道永世不易,而制度却随时变通,如果把制度固定反而害道。事实上,戴望也深谙此理,他以己意编辑《颜李学记》,对颜元著作多有改动,如他不认同颜元恢复井田的主张,<sup>②</sup>就在《存治篇》删去《王道》、《井田》等编,又如删除颜元文中对训诂的批判,竟把“训诂”改为“章句”。

颜李诸学重实学反空疏的学风,颇与同讲事功的永嘉学派相近。如章太炎所言“北方颜、李诸公,廓除高论,务以修己治人为目的,盖往往与永嘉同风”<sup>③</sup>。孙衣言、孙诒让父子此时正有志于重振永嘉学派,自然被戴望引为同调,帮助收集相关资料。孙衣言给俞樾的信中言道“子高极推重永嘉学人,大可感。某欲略考永嘉学派,苦于简陋,幸属子高为一搜讨,晚宋、元、明以来,有非永嘉人而私淑郑、陈、蔡、薛者,尤可贵也。”<sup>④</sup>太平天国之后,颜李之学和永嘉学派在浙人重被发现,使得浙江学风出现新的改变,无疑与戴望、孙诒让父子等人学术交流和传播有着莫大关系。

平心而论,戴望讲公羊,倡颜李,意图整合传统思想资源,为内外交迫的社会提供一个总体的解决方案,未尝不是一位积极入世之人,而他又长期处在南京这一文化交流要地,与他接触之人,不管赞同还是反对,今文改制思想和颜李事功之学毕竟在士人中流传。因缘际会,通过他的宣扬,沉寂百年的颜李之学又获重生,为晚期改革运动者如康有为、宋恕、陈虬、章太炎等争相引用。<sup>⑤</sup>政治与学术本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学术的强力粘合特性,促使政治活动者想达到自己的目标,只能穿梭于这两个领域,各取所需。有清一代,汉宋之争不息,然而郭嵩焘终身服膺宋代程朱理学,宋学何曾束缚他成为晚清向西方学习最坚定的倡导者之一?<sup>⑥</sup>康有为汲取汉代《公羊》春秋,汉学岂能妨害他登上戊戌维新的中心舞台?世乱之际,两派都会攻击对方空疏无用,此时倒是汉宋调和论颇有见地,如朱一新所道:

自羲轩以逮今兹,自东海放乎西海,理之本诸大同者,无弗同也,而其间道术分歧,蠡牛旁出,人自以为许郑,家自以为程朱。许郑、程朱之在圣门,诚未知其能相说以解否也。而世之为许郑、程朱之学者,支别派分,壹若终古不可沟合,则未知许郑、程朱之学之果歧欤?抑未知其为学者自歧之欤?<sup>⑦</sup>

调和思想面面俱到,学理方面自是充足,然而思潮的出现都有时代、社会发展因素,也有自身演变特性。某个时期多由某种思潮成为主导,待其衰弱,另种思潮承袭而起,汉学、宋学发展无不如此。戴望所处的时代,乾嘉考据之学衰落,理学经世重拾山河,今文经学仍处暗流之中,(转第20页)

① 朱一新《答某生》,《佩弦斋杂存》卷上,光绪二十二年(1896)葆真堂藏版。

② 戴望曾针对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的提法,说道“不度乎今古之宜而言之”(《顾职方郡县论驳议》,《谪麟堂遗集》文卷一)

③ 章炳麟《孙逊学先生年谱序》,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④ 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64页。

⑤ 张舜徽论道“颜、李之学,自为方苞辈所黜,湮没无闻者垂二百年,望独能收拾遗书读之。抉择精言,意成是记。近世言清学者,始及时颜、李,皆望表章之力也。”(《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0—561页)此语当是确论。

⑥ 如郭嵩焘把程朱格物思想比附西方科学精神,说“洋人所著书多假格物为名,程子以物无不格为义,初不意有今日洋人之格物,乃适与此义合也。”(《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⑦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5页。



## 结 语

综上所述,在近代上海在移民大量涌入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同乡团体作为一种社会自治组织对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多元文化的构建以及外来人口的管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的存在是近代上海社会向前发展的一块基石。而同乡医院作为同乡团体的附属机构,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同乡及部分上海市民的看病就医问题。当然,我们对近代同乡医院作用的评估也需谨慎。单就数据而言,在抗战爆发之前,同乡医院就诊人数仅占当时上海医院就诊总人数的10%左右,同乡医院的床位数占当时上海医院总床位数的6%至7%,但平时在防疫服务、健康体检、接生助产和禁烟活动方面却比较活跃,尤其在两次淞沪抗战中的战时救护、难民救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近代上海同乡医院的作用与同乡学校不能同日而语。确切地说,同乡医院在参与上海公共卫生建设的作用上要高于医疗服务。尽管如此,同乡医院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流动人口巨大的上海仍然有着历史借鉴作用。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近代上海地域商帮比较研究”(批准:11YJA77000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赵 婧)

---

(接第122页)

他的境遇很是不堪。<sup>①</sup> 如果他知道二十年后,康有为将老瓶装新酒,公羊《春秋》被贯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风云际会而成为时髦之学,当会感叹时势的变化,而以他对西人痛恨的思维定势,又要疾呼“安得如唐宗明祖者,出救斯民于涂炭以否”?戴、康两人同讲公羊,指向完全相反,也说明着传统学术思想的活力和弹性。

(责任编辑:戴海斌)

---

<sup>①</sup> 俞樾给张文虎、唐仁寿的信中谈道“钧父言子高于六极竟得其五,止缺恶之一极,仆亦尝言子高于五伦竟缺其四,止得朋友之一伦。合此两言,其坎坷一生,可以概见。”(俞樾《与张啸山唐端甫》,《春在堂尺牘》卷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4辑,第643—644页)

**Academic Atmosphere of Zhejiang after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 1851 – 1864 ) —Researches Focusing on Dai Wang** **XU Li – wang**

After Taiping Army was suppressed , the Neo – Confucianism thought prevailed. But the intellectuals in Zhejiang , with Dai Wa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 went against such thought. Dai fiercely criticized the Confucianists of Song dynasty and advocated the knowledge of Yan and Li. His academic road mirrored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in late Qing dynasty.

**Local Education Society of Late Qing Dynasty—Focusing on Baoshan County** **GAO Jun**

The rise of local education societies was an obvious social phenomenon in late Qing dynasty when it began to carry out its New Deal. A short time after the Learning Encouragement Agency System was carried out , local education societies was restructured as education association. The role education association has play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education executive system and experience in study related activities was worthy of attention.

**The Anti – Colonial Cultural Praxis of Japan’ s Left – Wing Intellectuals in Manchukuo: A Case Study on the Sakubun School** **LIU Chao**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ultural groups in Manchukuo , the Sakubun School , formed by Japan’ s left – wing intellectuals who moved to northeast China in their early years , strategically posed vehement criticism against the colonial rule. They worked hard in the intellectual arena ,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in the aspect of social activities. All these cultural praxis not only undermined the legitimacy of Manchukuo as a puppet state , but also subverted the discourse formulated by “converted” Japanese Marxists that viewe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as an emancipatory anti – feudal enterprise.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Governments , Gentries and Common People in Local Societies before , during and after the Anti – Japanese War——from the Orphanage in Fenghua**

**CHENG Meng – xi**

In Chinese society , the operation of charity career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network. The government , gentries ( social elites) , and common people played different roles before and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Seeing from the whole , though the donation from local elites and common people were quite important for the surviving of the Orphanage , the Orphanage could pull through many crises thanks to the timely money or food from the government.

**Fate of Labor – capital Relationship of New Democracy——Change of Shanghai before and after the Five – anti Campaigns** **HUO Xin – bin**

After New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 the labor – capital relations became tense due to the complicated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worldly different political positions between workers and capitalists. The Five – anti campaigns led to the deterioration and imbalance of labor – capital relationship. From all these facts we could see that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 , capitalists as well a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lat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during the country’ 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Animal Diplomacy of New China with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LIU Xiao – chen**

The promotion of animal diplomacy of New China was influenced by Soviet Union , and the two countries had frequent animal exchange activities during the honeymoon period. However , the pandas and other rare animals given by China to North Korea was superior in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than to other countries. Such kind of diplomacy was highly political. To some extent , animal diplomacy can be regarded as